

主编 李天纲
中国国家图书馆藏
民国西学要籍汉译文献·伦理学

Little Essays Of Love and Virtue

爱情与道德

〔英〕伊利斯 (Havelock Ellis) 著 梁渭华 译



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
Shanghai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 Press

主编 李天纲
中国国家图书馆藏
民国西学要籍汉译文献·伦理学

Little Essays Of Love and Virtue

爱情与道德

〔英〕伊利斯 (Havelock Ellis) 著 梁渭华 译



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
Shanghai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Press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爱情与道德/李天纲主编. —上海: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, 2017

(民国西学要籍汉译文献. 伦理学)

ISBN 978-7-5520-1826-4

I. ①爱… II. ①李… III. ①婚姻道德 IV. ①B823.2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7)第032147号

爱情与道德

主 编: 李天纲

编 纂: 赵 炬

责任编辑: 唐云松

特约编辑: 陈宁宁

封面设计: 清 风

策 划: 赵 炬

执 行: 取映文化

加工整理: 嘎 拉 江 岩 牵 牛 莉 娜

责任校对: 笑 然

出版发行: 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

上海顺昌路 622 号 邮编 200025

电话总机 021-63315900 销售热线 021-53063735

<http://www.sassp.org.cn> E-mail: sassp@sass.org.cn

排 版: 上海三联读者服务合作公司

印 刷: 常熟市人民印刷有限公司

开 本: 650×900毫米 1/16开

印 张: 9.75

字 数: 128千字

版 次: 2017年4月第1版 2017年4月第1次印刷

ISBN 978-7-5520-1826-4/B.201

定价: 60.00元 (精装)

民国西学：中国的百年翻译运动

——『民国西学要籍汉译文献』序

李天纲

继唐代翻译印度佛经之后，二十世纪是中文翻译历史上的第二个高潮时期。来自欧美的『西学』，以巨大的规模涌入中国，参与改变了一个民族的思维方式，这在人类文明史上也是罕见的。域外知识大规模地输入本土，与当地文化交换信息，激发思想，乃至产生新的理论，全球范围也仅仅发生过有数的那么几次。除了唐代中原人用汉语翻译印度思想之外，公元九、十世纪阿拉伯人翻译希腊文化，有一场著名的『百年翻译运动』之外，还有欧洲十四、十五世纪从阿拉伯、希腊、希伯来等『东方』民族的典籍中翻译古代文献，汇入欧洲文化，史称『文艺复兴』。中国知识分子在二十世纪大量翻译欧美『西学』，可以和以上的几次翻译运动相比拟，称之为『中国的百年翻译运动』、『中国的文艺复兴』并不过分。

运动似乎是突如其来，其实早有前奏。梁启超（1873-1929）在《清代学术概论》中说：『自明末徐光启、李之藻等广译算学、天文、水利诸书，为欧籍入中国之始。』利玛窦（Matteo Ricci, 1552-1610）、徐光启、李之藻等人发动的明末清初天主教翻译运动，比清末的『西学』早了二百多年。梁启超有所不知的是：利、徐、李等人不但翻译了天文、历算等『科学』著作，还翻译了诸如亚里士多德《论灵魂》（《灵言蠡勺》）、《形而上学》（《名理探》）等神学、哲学著作。梁启超称明末翻译为『西学东渐』之始是对的，但他说其『范围亦限于天（文）、（历）算』，则误导了他的学生们一百年，直到今天。

从明末到清末的『西学』翻译只是开始，而且断断续续，并不连贯成为一场『运动』。各种原因导致了『西学』的挫折：被明清易代的战火打断；受清初『中国礼仪之争』的影响；欧洲在1773年禁止了耶稣会士的传教活动，以及儒家保守主义思潮在清代的兴起。鸦片战争以后很久，再次翻译『西学』，仍然只在上海和江南地区。从翻译规模来看，以上海为中心的翻译人才、出版机构和发行组织都比明末强大了，影响力却仍然有限。梁启超说：『惟（上海江南）制造局中尚译有科学书二三十种，李善兰、华蘅芳、赵仲涵等任笔受。其人皆学有根底，对于所译之书责任心与兴味皆极浓重，故其成绩略可比明之徐、李。』梁启超对清末翻译的规模估计还是不足，但说『戊戌变法』之前的『西学』翻译只在上海、香港、澳门等地零散从事，影响范围并不及于内地，则是事实。

对明末和清末的『西学』做了简短的回顾之后，我们可以有把握地说：二十世纪的中文翻译，或曰中华民国时期的『西学』，才是称得上有规模的『翻译运动』。也正是在二十世纪的一百年中，数以千计的『汉译名著』成为中国知识分子的必读教材。1905年，清朝废除了科举制，新式高等教育以新建『大学堂』的方式举行，而不是原来尝试的利用『书院』系统改造而成。新建的大学、中学，数理化、文史哲、政经法等学科，都采用了翻译作品，甚至还有西文原版教材，于是，中国读书人的思想中又多了一种新的标杆，即在『四书五经』之外，还必须参考一下来自欧美的『西方经典』，甚至到了『言必称希腊、罗马』的程度。

我们在这里说『民国西学』，它的规模超过明末、清末，它的影响遍及沿海、内地；它借助二十世纪的新式教育制度，渗透到中国人的知识体系、价值观念和行为方式中，这些结论虽然都还需要论证，但从一般直觉来看，是可以成立的。中国二十世纪的启蒙运动，以及『现代化』、『世俗化』、『理性化』，都与『民国西学』的翻译介绍直接有关。然而，『民国西学』到底是一个多大的规模？它是一

个怎样的体系？它们是以什么方式影响了二十世纪的中国思想？这些问题都还没有得到认真研究，我们并没有一个清晰的认识。还有，哪些著作得到了翻译，哪些译者的影响最大？『西学东渐』的代表，明末有徐光启，清末有严复，那『民国西学』的代表作在哪里？这一系列问题我们并不能明确地回答，原因就在我们对民国翻译出版的西学著作并无一个全程的了解，民国翻译的那些哲学、社会科学、人文学科的『西学』著作，束之高阁，已经好多年。

举例来说，1935年，上海生活书店编辑《全国总书目》，『网罗全国新书店、学术机关、文化团体、图书馆、政府机关、研究学会以及个人私家之出版物约二万种』。就是用这二万种新版图书，生活书店编制了一套全新分类，分为：『总类、哲学、社会科学、宗教、自然科学、文艺、语文学、史地、技术知识』。一瞥之下，这个图书分类法比今天的『人大图书分类法』更仔细，因为翻译介绍的思潮、学说、学科、流派更庞大。尽管并没有统一的『社科规划』和『文化战略』，『民国西学』却在『中国的文艺复兴』运动推动下得到了长足发展。查看《全国总书目》（上海，生活书店，1935），在『社会科学·社会学一般·社会主义』的子目录下，列有『社会主义概论、社会主义史、科学的社会主义、无政府主义、基尔特社会主义、乌托邦社会主义、基督教社会主义、议会派社会主义』等；在『社会科学·政治·政体政制』的子目录下，列有『政治制度概论、政治制度史、宪政、民主制、独裁制、联邦制、各种政制评述、各国政制、中国政制、现代政制、中国政制史』等，翻译、研究和出版，真的是与欧美接榫，与世界同步。1911年以后的38年的『民国西学』为二十世纪中国学术打下了扎实的基础，而我们却长期忽视，不作接续。

编辑出版一套『民国西学要籍汉译文献』，把中华民国在大陆38年期间翻译的社会科学和人文文学著作重新刊印，对于我们估计、认识和研究『中国的百年翻译运动』、『中国的文艺复兴』，接续当

时学统，无疑是有着重要的意义。1980年代初，上海、北京的学术界以朱维铮、庞朴先生为代表，编辑『中国文化史丛书』，一个宗旨便是接续1930年代商务印书馆王云五主编『中国文化史丛书』，重振旗鼓，『整理国故』，先是恢复，然后才谈得上去超越。遗憾的是，最近三十年的『西学』研究却似乎没有采取『接续』民国传统的方法来做，我们急急乎又引进了许多新理论，诸如控制论、信息论、系统论……还有『老三论』、『新三论』、『后现代』、『后殖民』等等新理论，对『民国西学』弃之如敝屣，避之唯恐不及。

民国时期确实没有突出的翻译人物，我们是指像严复那样的学者，单靠『严译八种』的稿酬就能成为商务印书馆大股东，还受邀担任多间大学的校长，几份报刊的主笔。但是，像王造时（1903-1971）先生那样在『西学』翻译领域做出重要贡献，然后借此『西学』，主编报刊、杂志，在『反独裁』、『争民主』和『抗战救国』等舆论中取得重大影响的人物也不在少数。王造时的翻译作品有黑格尔的《历史哲学》、摩瓦特的《近代欧洲外交史》、《现代欧洲外交史》、拉铁耐的《美国外交政策史》、拉斯基的《国家的理论与实际》、《民主政治在危机中》。1931年，王先生曾担任光华大学教授，文学院院长，政治系主任，后来创办了《主张与批评》（1932）、《自由言论》（1933），组织『中国民权保障同盟』（1932）。他在上海舆论界发表宪政、法治、理性的自由主义；他在大学课堂上讲授的则是英国费边社社会主义、工联主义和公有化理论（见王造时著《荒谬集·我们的根本主张》，1935，上海，自由言论社）。非常可惜的是，王造时先生这样复杂、混合而理想主义的政治学理论和实践，在最近三十年的社会科学、人文学科中并无讨论，原因显然是与大家不读，读不到，没有再版其作品有关。

我们说，『民国西学』本来是一个相当完备的知识体系，在经历了一个巨大的『断裂』之后，学者并没有好好地反省一下，哪些可以继续和发展，哪些应该批判和扬弃。民国时期好多重要的翻译著作，我

们都没有再去翻看，认真比较，仔细理解。『改革、开放』以后，又一次『西学东渐』，大家只是急着去寻找更加新颖的『西学』，用新的取代旧的，从尼采、弗洛伊德……到福柯、德里达……就如同东北谚语讽刺的那样：『熊瞎子掰包谷，掰一个丢一个。』中国学者在『西学』宝库中寻找更新式的装备，在层出不穷的『西学』面前特别害怕落伍。这种心态里有一个幻觉：更新的理论，意味着更确定的真理，因而也能更有效地在中国使用，或者借用，来解决中国的问题。这种实用主义的『西学观』，其实是一种懒惰、被动和浮躁的短视见解，不能积累起一个稍微深厚一点的现代文化。

讨论二十世纪的『西学』，一般是以五四『新青年』来代表，这其实相当偏颇。胡适、陈独秀等人固然在介绍和推广『西学』，倡导『启蒙』时居功至伟，但是『新文化运动』造成不断求新的风气，也使得这一派的『西学』浅尝辄止，比较肤浅，有些做法甚至不能代表『民国西学』。胡适先生回忆他们举办的《新青年》杂志，有一个宗旨是要『输入学理』，即翻译介绍欧洲的社会科学、人文学科知识，他还大致理了一个系统，说『我们的《新青年》杂志，便曾经发行过一期『易卜生专号』，专门介绍这位挪威大戏剧家易卜生，在这期上我写了首篇专论叫《易卜生主义》。《新青年》也曾出过一期『马克思专号』。另一个《新教育月刊》也曾出过一期『杜威专号』。至于对无政府主义、社会主义、共产主义、日耳曼意识形态、盎格鲁·萨克逊思想体系和法兰西哲学等等的输入，也就习以为常了。』（唐德刚编译：《胡适口述自传》，北京，华文出版社，1992年，第191页）。胡适晚年清理的这个翻译目录，就是那一代青年不断寻找『真理』的轨迹。三四十年间，他们从一般的人性论学说，到无政府主义、社会主义、马克思主义；从不列颠宪政学说，到法兰西暴力革命理论、德意志国家主义思想，再到英格兰自由主义主张，大致就是『输入学理』运动中的全部『西学』。

胡适一语道破地说：『这些新观念、新理论之输入，基本上为的是帮助解决我们今日所面临的实际

问题。』胡适并不认为这种『活学活用』、『急用先学』的做法有什么不妥。相反，二十世纪中国知识分子接受『西学』的方法论，大多认为翻译为了『救国』，如同进口最新版本的克虏伯大炮能打胜仗，这就是『天经地义』。今天看来，这其实是一种庸俗意义的『实用主义』，是生吞活剥，不加消化，头痛医头，脚痛医脚的简单思维，或曰：是『夺他人之酒杯，浇自己之块垒』。从我们收集整理『民国西学要籍汉译文献』的情况来看，『民国西学』是一个比北大『启蒙西学』更加完整的知识体系。换句话说，我们认为『五四运动』及其启蒙大众的『西学』并不能够代表二十世纪中国西学翻译运动的全部面貌，在北大的『启蒙西学』之外，还有上海出版界翻译介绍的『民国西学』。或许我们应该把『启蒙西学』纳入『民国西学』体系，『中国的百年翻译运动』才能得到更好的理解。

我们认为：中国二十世纪的西学翻译运动，为汉语世界增加了巨量的知识内容，引进了不同的思维形式，激发了更大的想象空间，这种跨文化交流引起的触动作用才是最为重要的。二十世纪的中国文化变得不古不今，不中不西，并非简单的外来『冲击』所致，而是由形形色色的不同因素综合而成。外来思想中包含的进步观点、立场、方案、主张、主义……具有普世主义的参考价值，但都要在理解、消化、吸收后才能成为汉语语境的一部分，才会有更好的发挥。在这一方面，明末徐光启有一个口号可以参考，即便是『欲求超胜，必须会通；会通之前，必先翻译』。反过来说，『翻译』的目的，是为了中西文化之间的融会贯通，而非搬用；『会通』的目的，不是为了把新旧思想调和成良莠不分，而是一种创新——『超胜』出一种属于全人类的新文明。二十世纪的『民国西学』，是人类新文明的一个环节，值得我们捡起来，重头到底地细阅读，好好思考。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邀我主编『民国西学要籍汉译文献』，献弁言于此，是为序。

「英」伊利斯（Havelock Ellis）著 梁渭華 譯

愛 情 與 道 德

中華民國二十七年十月初版

序

愛情與道德是著名的性理學家 Dr. Havelock Ellis 所著此書原文名字是 *Little Essays of Love and Virtue* 在 1911 年三月出版，同年五月再版，1930 年三版。牠受讀者熱烈和繼續不斷的歡迎，可以由牠再版的次數和年月日看出來。至於牠的價值，只要是讀過愛氏的名著性心理學，都會承認牠的作品是充滿了科學的論據和精到的評斷；而且作者又是一個樂觀派的人文主義者，他的觀點是偏於實際的，他的建議是切合人生的。尤其其他著這本書的動機，是以經驗與研究的結果，給青年人一種關於性愛的指導。我們由這本書裏頭可以認識性愛的真正的意義，固有的價值和牠偉大的力量；同時我們又可以得到指導性愛的途徑。尤其是現代的中國青年，對於性愛每失之於誤解和亂用，應當對於這本書仔細閱讀一下。

這本書一共分爲七章：第一章，子女與父母。第二章，貞潔的意義。第三章，結婚的目的。第四章，夫

與妻。第五章，女子的愛情權利。第六章，性的表演功能。第七章，個人與種族。

在第一章裏，作者認為以往的父母有兩種：一種是使子女完全為自己而生活，結果泯滅了子女天賦的特性，摧殘了子女發展的機能，他們對於子女是專制的。還有一種是他們完全爲子女而生活，結果是放縱，是溺愛，子女成了他們專制的暴君。以上兩種完全相反的態度，卻產生出同樣惡劣的結果。所以他很痛切的說：「父母不但要訓練他們的子女，而且要先訓練他們自己。」他認為父母最重要的職責，就是給在兒童期的子女以一種生活的準備；並不是一味庇蔭他們，保護他們，使他們隔絕於他們必須投入的世界。

在第二章裏，作者指明以往的貞潔觀念是建築在禁慾主義之上；而這種錯誤完全是因爲對於性慾沒有正確認識。其實性慾是人類生理方面心理方面最微妙，最複雜，最有力的組織和動作。要消滅牠，是絕對不可能的。只能夠把牠轉移到一個更近人性和社會性的形式之中；這種轉變的程序，就叫做昇華作用，而往往使人生美化，人性滿足。所以他說：「性的貞潔，並不是禁絕性慾的表現，而是一種性的昇華作用，把牠轉到更優美的形式之中。」而這種昇華作用是有限度的，所以他

又說：兩性互相的調劑和兩性合力適應優美人生中更偉大的目的，便是永久的道德訓練。他進一步主張近代所需要的是熱情，更充分的熱情。杜絕了性愛，便入了地獄。

第三章裏頭，所謂婚姻的目的有兩種：一種是生育，這是原始的目的，亦可以說是動物性的目的；對於這種目的，人類一向是偏重的。還有一種是愛的結合，這是近代的目的，亦可以說是精神的。這種目的滿足，使男女兩性感到性愛的調諧，好像一個音樂師和他的樂器一樣；在這些地方，他充分地表現着他對於性愛的靈肉一致觀。他說：「當性愛成熟的時候，只要向人性合理的程度發展，就會感到肉體的結合，亦是靈魂的結合」。

第四章，關於夫與妻，作者認為以往的夫妻關係是不平等的：他是主人，她是奴隸，她的最大職責便是服從她的丈夫；而且她的生活範圍又只限於家庭之內。她的天性沒有充分發展的可能，她的才力沒有運用的機會，她承認這樣忍受着，甚至於現代的婦女，在家庭中仍然不免感受這種屈抑的痛苦。作者對於打破婦女的鎖鍊，有兩種建議：（一）物質方面，實行生育節制，促進社會分工，使家庭簡單化。（二）精神方面，克制私念，嫉妒和佔有性，使夫妻間獲得互相諒解，互相信託。

第五章，女子的愛情權利，書中有一段話說的最透徹大意是：在色情的領域中，一個女子所最需求於一個男子的，是他能把她由冷靜的境界中超拔到一個更高的境界，使她愛情的行動中感到彼此的關切和互相的快慰。她這種靜默的需求亦就是大自然的需求。一個男子什麼樣的態度纔能適應女子愛的需求呢？作者說：現代的青年男子對於女子和婚姻具有一種新的態度。這種新的態度是單純的，是坦白的，是有一種互相信賴的願望，共同討論困難的決心，而且有求對方了解的需求。

第六章，愛的表演功能，男女之間只有呆板的性生活而沒有愛的表演，不但是減少生活的趣味，而且妨礙人生的圓滿發展。尤其在女子方面，她是需求愛的撫慰和鼓舞。作者認為只有愛的表演能把男女引入人類最高尚的活動，感到靈肉的調諧，快樂的陶醉。這種默契，就是夫妻間最真實，最穩固的同心結，比任何宗教的儀式都要有力量。

末一章，個人與種族，佔全書的篇頁最多，全章可分為三層：（一）個人的福利和種族的福利是一致的，書中說：我們最希望的就是，改進了個人的環境，同時亦促進了人羣的福利。這種個人和

種族福利協調的可能性是根據兩種條件：（甲）個性的要求自然會限制其他個性的過度發展，（乙）個人所要求的也就是多數個人所要求的。但是只根據這兩種條件，個人和種族的福利還不能調適到好處，所以作者進一步提用第（二）層的意思，是要運用真實的科學和偉大的藝術，那就是優生學和生育限制。（三）他認為實行生育限制的結果，自然能夠達到優生的目的。除了這三種理論的申述外，他列舉各國生育限制的事實，並且指出普通人對於生育限制的曲解和錯誤觀念。他援引的豐富，和辯論的詳盡，使我們益發感到他持論的正確。——譯者

目次

第一章	父母與子女	一
第二章	貞潔的意義	二一
第三章	婚姻的目的	四三
第四章	夫與妻	五二
第五章	女子的愛情權利	七四
第六章	性的遊戲機能	八六
第七章	個人與種族	一〇一

愛情與道德

第一章 父母與子女

我們都知道，二十世紀常常被認為『兒童的世紀。』但只要翻一翻同情於這種觀點的作者愛倫凱（Ellen Key）的書籍，我們就不免要問兒童的世紀，究竟帶給兒童多少福利？愛倫凱指出，甚至於在我們的世紀中，大部分的父母都可以分為兩類：一類是使他們的子女專為他們自己的利益而生存；另一類是他們專為他們子女的利益而生存。愛倫凱認為這兩類的結果是同樣的悲慘。第一類的父母對於子女是壓制的；對於子女的個性是要摧殘的；對於子女的訓練是專斷的，是無恆的，結果產生不出什麼良好的影響，只不過把子女造成和他們自己一樣的模式，而這種模型的造成，對於他們應該是一件苦惱的事。至於第二類的父母，他們並不希望子女仿效他們自己，他